

# 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视角看 近现代日本的扩张战略

## ——评《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

安成日

武汉大学教授熊沛彪博士撰写的《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一书,于2005年9月正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熊沛彪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经数年的深入研究、补充、打磨之后推出的一部具有相当学术功力的日本近现代对外侵略扩张史研究专著。该书比较充分地利用中日两国的档案、相关人士的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系统地勾画和论述了自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形成和展开的全过程。

该书共9章,由“序章 近现代日本对外扩张战略与中日战争”;“第一章 东亚国际体制的动荡与日本对外战略扩张的初步展开”;“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与华盛顿体系的动摇”;“第三章 日本东亚新秩序政策的初步展开”;“第四章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战争目标与东亚战略”;“第五章 日本的战略调整与武汉、广州会战”;“第六章‘东亚新秩序’与日本既定战略的进一步开展”;“第七章 欧洲大战的爆发与日本的战略对策”;“第八章 日本的南进战略措施”构成。该书以丰富新颖的资料,从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视角,对近现代日本的霸权战略进行了深入再探讨。

新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新视角、新研究方法的导入必然带来学术研究上的新突破。纵观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该书在资料方面有新的突破。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研

究可以说都是一些老问题,老问题要想有新的突破,就需要新的资料的发掘。以往国内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研究,除了极少部分研究著作以外,在第一手资料方面,多局限于国内的档案资料和有关人士回忆录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的基础之上。由于近现代日本史研究及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研究的历史较长,目前国内能够继续挖掘和利用的资料已不多。熊沛彪博士利用到日本学习、研究的机会历访日本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收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日本近现代对外扩张政策、对外战略方面的外务省和军部的原始档案、个人遗存文献等,从而突破了以往研究的资料方面的局限。

其次,该书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过去的日本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研究,在角度与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都从日本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角度或双边关系的角度研究近现代日本历史和对外关系。很少有人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视角对近现代日本历史和对外关系进行探讨。该书变换了研究视角,故使人耳目一新。

以东亚区域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为线索,从战略分析的角度,论述了近现代日本霸权政策(战略)的形成、扩展过程。在这个大框架下,对近现代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中的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再探讨或开拓性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日本东亚霸权政策的起始或成型的问题,中日两大学界一直存在极大的意见分歧。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日本的东亚霸权政策始于明治维新,最近有学者又提出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依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学界基本否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出过“霸权战略”,少数学者则认为,日本称

霸东亚的战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才确定的。该书在对原始资料进行缜密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与以往任何观点都不相同的新结论,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初步确立了称霸东亚的东亚新秩序政策,同时初步拟定了称霸东亚的战略步骤”(见该书第3页)。

第二,关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的“二重外交”,中日学界认识上的差异极大。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外务省根据政府的方针推行“协和外交”、“经济外交”、“佐藤外交”,极力谋求改善九一八事变以后极度恶化的对华关系,使中日关系有可能向和平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军方越权,强行推行对华“武力外交”,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使政府和外务省的对华政策陷入了困境,并最终宣告失败,使日本走上战争道路。日本学界还认为,“外务省是主张和平的”。日本学者的这种观点淡化甚至掩盖了日本政府的责任,其论证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学界则一直不同意有“二重外交”存在,认为日本统治阶级在侵华问题上是一致的,日本外务省放出和平烟幕的目的是为军方的军事侵略作掩护,所谓的“二重外交”实际上是日本统治阶级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该书在梳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学者对“二重外交”的认识,没有看到日本外务省的对华战略目标——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属国的既定方针;中国学界迄今为止又忽略了国际关系对日本造成相当的制约倾向,没有看到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在侵华步骤、方式和手段方面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之间确实在侵华问题上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外务省主张以外交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解决对华全盘问题,既解决所谓的‘中日悬案’;军部则主张主要以武力为手段,先取蚕食的方式尽快实现华北自治,以利于日本控制,在此基础上,再伺机决绝全盘对华问题。”(见该书第8页)日本军政当局内

部存在这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于,日本庞大的霸权战略目标和自身有限实力之间的矛盾。日本庞大的霸权总战略要求对付的强敌依次有苏、英、美等,在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过程中,过分投入国力显然不利于日本的总战略实现。因此,外务省方面主张,首先要以外交手段拉拢和胁迫国民政府屈从日本的战略要求,以便逐步将中国变为其附属国。军部方面则主张着眼点不必放在拉拢和胁迫南京政府方面,要继续实施蚕食政策,先使华北独立,再使其他地区先后归附日本,最后使全中国归附日本。“由于对外战略目标的庞大,而日本的自身实力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重负,军国主义的野心又决定了日本不会放弃霸权目标,因此,其内部就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意见纷纭,矛盾和混乱不断,内阁也以不断更替”(见该书第8页)。

第三,“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的‘佐藤外交’问题。以往,中国学界因为缺乏史料,较少对‘佐藤外交’深入研究,并笼统地认为,‘佐藤外交’是日本掩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烟幕,并断言‘佐藤外交’就是战争。日本学界对‘佐藤外交’的研究也很少,著名的外交史专家白井胜美教授写过一篇论文,强调,‘佐藤外交’的性质是经济的、和平的,由于军部的强硬反对而夭折。该书则认为,‘佐藤外交’仍然是围绕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权战略目标展开的,其手段和方式虽不像军部那么强硬,但其实质并无二致。只是‘佐藤外交’时期,日本尚未来得及制定具体的战争实施时间、步骤而已(见该书第113—126页)。

第四,关于中日战争何时进入全面战争阶段的问题,学界认识不一致。中国学界认为,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中国被迫开始全面抗战,中日即进入全面战争阶段。日本学界则认为,“卢沟桥事变”系突发性事件,最初,日本政府决定了“不扩大方针”,经过多次调整和部署,至1937年8月中旬上海事变爆发时才

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并由华北和上海两个方面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中日战争于是乎进入全面战争阶段。该书则认为，战争规模是由战争目标规定的，根据各种史料，在七七事变和上海事变初期，日本制定的战争目标属于局部性的，但七七事变以来，日本鉴于军事行动取得巨大战果，于是不断将战争目标升级，至上海事变末期，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并将战争目标升至极限——全面征服中国，同时着手建立战时总动员体制，以保证所有国力可以及时投入对华战争。因此，《熊著》以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发出攻占南京令为标志，认为中日战争进入全面战争阶段（见该书第176页）。

第五，关于日德谈判结盟问题。以往学界对日德双方战略分歧的研究不足。该书提出，日德之间发生严重战略分歧的根源在于日本无法对华速战速决，其陆军主力被中国军民牢牢牵制住，其国力也随之被不断的大量消耗。所以，日本认定，只要对华战争不结束，就难以伙同德国发动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因此，日德谈判至欧洲大战爆发耗时一年多，毫无结果。

第六，关于欧洲大战爆发后日本的“不介入欧战的方针”。抓紧与法国进行了谈判。该书指出：日本的“不介入欧战的方针”，“含有与英、法、美讨价还价，逐步迫使三国停止抑日援华，以加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是“东亚新秩序政策的需要”。“不介入方针”也并不完全排除“在一定条件下武力介入的可能性”（见该书第240—242页）。

尽管该书有上述创新和开拓性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主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

首先，该书作为研究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的学术专著，未能完整地论述日本近现代霸权战略的确立、展开和破灭全过程。由于该书叙述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书中并没有涉及日本近现

代霸权战略走向破灭的过程。因此,读罢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熊著》如果设“终章”对日本近现代霸权战略走向破灭的过程作进一步交代,当显更加完美。

其次,该书在资料的运用上也有偏颇。近现代日本的霸权战略不仅涉及中国也涉及美、英、法、荷等欧美国家。但在作者未能对上述国家的第一手资料给予足够的重视,多侧重于日方资料。这种资料运用上的偏颇也可能影响作者的客观、公正、科学的观点的形成。

第三,该书在不少问题上的论述也缺乏足够的分析和论证,多有浅尝辄止感觉。很多问题只是提了出来,却未见答案。

最后,该书也多处存在明显的笔误或校对错误。

虽然该书有上述瑕疵,但总的来看,仍不失为近年来在日本近现代史及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又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力作。

(作者安成日,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